

· 田野人文丛书 ·

理性与文化之间

——一桩土地纠纷之分析

著 者 / 吕文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教材事业部 (010) 65281150

电子信箱 / jiaocai@ssap.cn

项目经理 / 杨桂凤

责任编辑 / 郑 嫻

责任校对 / 樊 志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20

印 张 / 10.6

字 数 / 126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0118 - 8 / D · 0045

定 价 / 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数年以前，文江以历史学的背景考入重建不久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其时我刚刚从美国回国任教，他便跟随我读人类学。老实说，虽然跨越学科的藩篱绝对应该受到鼓励，但这种半路出家式的学习对他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人类学的理论本不易把握，田野调查更是对人的考验，而能在结合两者的基础上最终做出一篇像模像样的民族志，则多少带有冒险的成分。在四年学习以及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文江遇到过很多困惑，但他最终还是克服了障碍，完成了研究与论文撰写任务。我想这种磨炼对他今后从事学术工作应能起到良好的作用。

行内的人通常说，完成一次标准的田野调查是修习人类学的“成丁礼”。文江的田野考察地点由我帮他选定，这是西北黄河岸边一个名叫大川的库区村庄。十年前我出版的第一本英文专著，就是以该村孔庙的重建为窗口，透视村民对于当年水库移民的苦痛记忆在当今包含的道德与

政治分量。我本人在大川的调查中也曾注意到村民们对于外部带来的环境污染的抗争行为。让文江前往同一个地方，我的本意是期待他能对生态变化与人的关联，或者更宽泛地说是所谓“人化自然”的议题进行一个完整系统的调查与分析。就此，有一些生态人类学范围的作品以及一些从历史、政治角度对生态问题进行探讨的作品可以用作参照。

为完成调查，文江曾前后三次长住大川，总计八个月的时间，其中第二次还正值“非典”时期。文江在田野期间虽然也在诸如水污染、土地盐碱化方面进行了调查，但他却更为一桩土地纠纷所吸引。对于这桩复杂的土地纠纷的诸多方面，文江在书中已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与分析，我就不再赘述。我要说明的是他把土地纠纷放到乡村生活的整体性中理解并带入历史维度的思考，他由土地纠纷案例概括出“经济理性”与“文化理性”的对立并对这一矛盾的普遍含义有所揭示。

文江的这部处女作已颇有人类学“气象”。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当然乐于看到本书的杀青。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类学博士能够较快地将博士论文出版。

景 军

2007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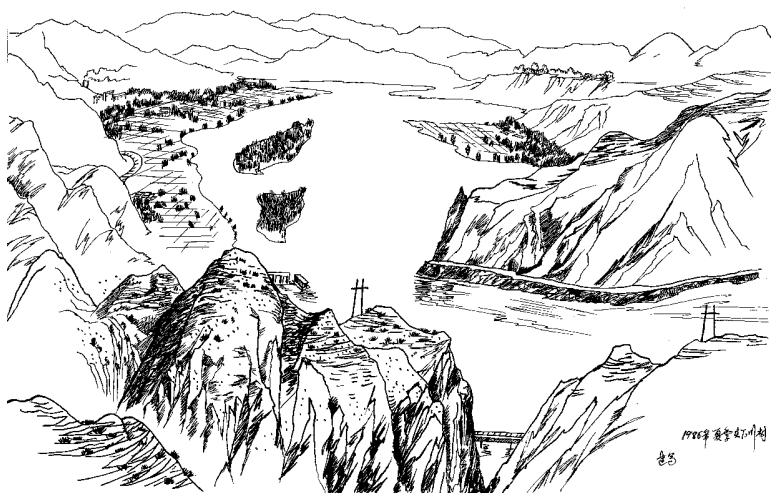


图1 大川村民孔文玉于1986年夏绘制的大川村图
(图中左岸为大川,对岸为白川,中间两个小岛今天已由于
水库泥沙淤积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太极岛”,有关
这个岛的争议,是本书的中心议题。)



图 2 大川村沿河良田



图 3 大川村沿河芦苇荡



图 4 大川村方神庙



图 5 大川村娘娘庙前妇女念经场景



图 6 大川村旅游节开幕式表演



图 7 大川村边库区上的游船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一项通过土地纠纷对理性冲突的	
研究	1
一 提出问题	1
二 文献评论	3
三 田野介绍与研究方法	28
四 本书主旨与结构安排	36
第二章 土地与历史	39
引子	39
一 孔氏家族的历史：定居与分裂	44
二 土地开发与利用	54
三 水会仪式与村庄边界	66
四 小结	82
第三章 土地与国家	84
一 现代国家的进入	84
二 土改	89

三	电站修建与水库移民·····	104
四	小结·····	117
第四章	土地与市场·····	119
一	村内的经济分化·····	120
二	土地的市场化与两类村庄精英·····	132
三	小结·····	147
第五章	多重矛盾中的土地纠纷·····	150
一	两村争执与政府介入·····	150
二	方神庙中的冲突·····	160
三	老人与工作组·····	169
四	土地之争与权力之争·····	174
第六章	结论：在文化与理性之间·····	180
	参考文献·····	189
	致谢·····	201

第一章

导言：一项通过土地纠纷 对理性冲突的研究

一 提出问题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乡村社会的同时，针对农村的制度建设却可谓密集：村民自治、农地制度改革、税费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更为广泛的“送法下乡”，^① 这些或者早已付诸实施，或者已经提上日程。从直接政治与行政控制走向制度建设之路，^② 显示出国家在治理方式上的重要转变，^③ 而“善治”

① 这里借用法社会学家朱苏力近年一本著作的题名。

② 在我看来，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引进并在近年如日中天的“制度经济学”，从一个重要方面显示了制度建设在中国已经走上了一个有意识的自为阶段。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不同，制度经济学家关注的重心在于所谓的“制度资本”。参见盛洪《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载《现代制度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③ 萧凤霞提醒我们要注意“国家的内卷化”：“在改革开放的时期，党政系统宣布要把它沉重的机器从社会中抽出，地方的人和机构却实际上不自觉地复制着这套机器。”见萧凤霞《廿载华南研究之旅》，程美宝译，《清华社会学评论》2001 年第 1 期，第 188 页。

也成为政府有意追求的目标。

不过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论者和观察者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在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某些地方政府机构与农民^①之间的纠纷与冲突层出不穷，这些纠纷与冲突的出现，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作为一个数目众多但缺乏组织的弱势群体，其基本经济与政治利益在这个社会转型时期遭到一定程度的忽视或侵犯。^② 作家陈桂棣、春桃笔下当今的一些普通农民，其生存状况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③ 有人甚至认为，在中国当前相关的政治安排格局下，农民面对他们遭受的不公而缺乏抗争能力的状况似乎已经被制度化了。^④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在当前权力与资本的运作格局下，“农民失地”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⑤

① 这里所说的农民，是指作为身份与社会地位意义上的农民，而不论其是否主要从事农作。用英文来表达，这里所讲的农民是“Peasant”，而不是“Farmer”。

② 参见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③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④ Cai, Yongshun. 2003. Collective Ownership or Cardres' Ownership? The Non-agricultural Use of Farmland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75 (Sep.), pp. 662-680.

⑤ 参考李培林《2004~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见 <http://gb.chinabroadcast.cn/3821/2004/12/14/301@391148.htm>），其中提出困扰中国社会的六大社会问题，居于首位的就是农民失地引发的社会矛盾。据该报告，中国目前失地农民达 4000 万，而且预计今后每年将以 200 万的数字增长。

已有不少文献涉及目前的土地问题，但其中多是从结构与宏观面相进行的讨论。本书则试图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强化主体—微观层面的讨论。简单说来，本书通过对一起较为复杂的土地纠纷案例的研究，不但分析利益的冲突所在，而且剖析理念的冲突，其中重点剖析几个利益群体对理性的不同理解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为模式。

二 文献评论

1. 文献评论

(1) 农民学研究 with 理性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者来说，如何定义“农民”（Peasant）可能是他们首先会遇到，并需要不断回归的一个问题。从农民学的研究传统来说，学者们有关这一定义的争论已经延续了数十年。其中美国人类学家沃尔夫（E. Wolf）以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框架给出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民的主要追求在于维持生计，并在一个社会关系的狭窄等级系列中维持其社会身份，以此不同于那些专门为满足市场而生产并使自己在—个广泛的社会网络内置身于地位竞争中的耕作者。^① 《不列颠

^① 后者被称作“Farmer”（农业者/农民），他们充分地进入市场，使自己的土地与劳动从属于开放的竞争，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以使报酬极大化，并倾向于在更小的风险基础上进行可能获得更大利润的生产。（Wolf, Eric. 1969. *Peasant W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Harper & Row, pp. 14 - 15.）

百科全书》中的“农民”词条则强调，“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特征”并不是传统农民定义的要件，其根本特征在于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在农民社会，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来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① 这一定义，跟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的人类物质交换及经济整合的三种理想类型，尤其是从“再分配”到“市场”的转变密切相关。^② 更进一步来看，这一定义也牵涉经济人类学中的实质论与形式论（Substantialism-formalism）之争。^③ 用最为概括的语言来讲：“实质论”认为人类的经济活动并不具备自足的意义，它是“嵌入”^④ 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之中的；反之，主要为各种流派的

① Britannica;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ition, Vol. 9. London: Willim Benton, 1976. p. 229.

② 这三种类型分别为“互惠”、“再分配”与“市场”，它们具有历史维度的意义（参见 Karl Polanyi, et al. 1957 (Eds.).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Karl Polanyi, et al. (Eds.) *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③ 有人亦将“Substantialism”译作“实体论”，似不确，本书采取“实质论”的译法。

④ “嵌入性”（Embeddedness）概念是波兰尼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提出的。其后，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 1985 年所撰《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 - 510），在重新检视波兰尼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弱嵌入”的观点。

经济学家所持有的“形式论”则认定“经济”是一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并从个人的经济理性出发对之予以解释。^①

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的开篇，作者黄宗智首先简明扼要地梳理了“农民学”研究的三个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之外，是实质论与形式论这两个被视为处于对立位置的学术传统：其中蔡雅诺夫—博兰尼—斯科特为前者的主要代表，而舒尔茨—波普金为后者的主要代表。黄宗智宣称自己对于华北小农的研究要综合以上的三种取向。^②

不过在我看来，黄宗智将蔡雅诺夫、斯科特与博兰尼划归一方并不确切，而去掉博兰尼之后的蔡雅诺夫—斯科特与舒尔茨—波普金之争，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发生于经济学内部的争议，并不完全是经济人类学的奠基者博兰尼所揭橥的实质论与形式论之争。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察，使黄宗智所称的综合农民学三种传统对中国近代小农经济的研究，事实上将重心落在“小农经济的内卷化”这一由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出发做出的论断上，^③而基本忽略了实质论多有强调的

① 参见张小军《经济人类学》，载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18~124页。

②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第1~7页。

③ 比如李伯重认为，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局限，而且实际上是一种新马尔萨斯主义，见杨念群等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92~793页。

制度乃至文化问题，并未做到形式论与实质论的综合。^① 我们如下以“斯科特—波普金之争”为例来说明，为什么蔡雅诺夫—斯科特与舒尔茨—波普金之争实际上是遵循“理性人”这一基本假设、发生在经济学内部的争议。

在《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② 这本具有越战背景的著作中，斯科特继承并发展了蔡雅诺夫数十年前对小农经济的认识。蔡雅诺夫曾经有力论证了处于生存压力下的传统小农，他们的经济行为虽然不同于自由市场中的资本家对于最大利润的追求，但其实诸如“自我剥削”、“饥饿地租”等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均是农民为保证生存所做出的再合理不过的选择。^③ 斯科特对 20 世纪上半期东

① 反对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而强调中西双向对比、求同先于求异的王国斌曾经评论到：黄宗智本来是要解释中国经济所特有的动力是什么，而不是要问中国为何未发展出资本主义，但在他对于中国小农经济的研究中，哪些特点他认为值得讨论，哪些问题他觉得无关紧要，却又取决于后者。“黄宗智实际上是以……经济学课程上所讲授的那种典型市场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只是未明说而已。”（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19、31 页。）黄宗智对于他有关“过密化/内卷化”分析的经济学边界，似乎也有一定的认识。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第 6~7 页。

② 原著书名为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③ 参见 Daniel Thorner 等人所编 *A. V. Chayanov on the Theory of Peasant Economy*.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尤其是其中的“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s”一文。

南亚农民的研究，同样把农民经济生活的“临界状态”^①置于其分析的中心。他强调，既要维持自身生活又要应付外界索取、经常在生存线上徘徊的农民采取着眼于降低风险而不是谋求最大收入的耕作技术与社会安排，是出于“形式理性”、由微观经济学可以解释的选择。^②由此相当自然的是，一旦农民的“生存安全”不论出自何种原因得到保障，他们就将是在波普金意义上的“理性小农”，会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勇猛精进。同时，具有可靠生存保障的地主，也比一般农民更加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风险的最小化。就此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斯科特与波普金实则各自强调了农民理性经济行为的一个方面，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争议可言。

不过，受博兰尼某些方面的影响，^③斯科特并未停留于对农民微观经济行为的阐述，而是发展到具有历史维度的对

① 所谓“临界状态”，斯科特是指以“生存安全”为主要关怀所在的农民处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1页。）

② 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例子：传统农民之所以不愿采用一个五年总产量会是老稻种两倍的新稻种，可能是因为种植新稻种的风险较大，比如它在第二年会因为旱灾而绝收，从而将农民直接置于因饥饿而借债、逃荒甚至死亡的境地。因此，农民选择五年总产量只是新稻种一半的老稻种，其实是一种保障生存安全的理性选择。

③ 与亚当·斯密认为早期社会是个人的自利不同，博兰尼强调只是在19世纪的自律市场中，经济自立才是主导的原则，而在早期社会，经济是具体“嵌入”在社会关系之中的；同时，19世纪的自律市场其实是个注定失败的乌托邦试验，现代资本主义是个人自利和非自利的合一。参见张小军《经济人类学》，载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农民社会一般特征的概括：他认为 19 世纪之前传统农民社会许多“奇特”的技术、社会与道德安排，具有保障（虽然并非总能实现）农民基本生存的潜在功能，其中尤以村庄内部的保险作用最为显著，传统村庄在斯科特这里被视作某种“道义共同体”。^① 随着 20 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东南亚殖民地国家^②的全面侵入，农民的基本生存安全网络^③遭到系统破坏，地主（更准确地说是稀缺生产要素所有者）及政府在波动的市场状况下对他们的固定索取，常常无视他们的生存伦理和道德期待，因而激起怨恨与反叛。^④ 这种反叛具有向后看、恢复原状的保守性质，而并不是经济、政治上要求权利/权力最大化的行为。^⑤ 对斯科

① 反之，波普金的“理性小农说”否认这种共同体意识的存在。对于乡村社会内聚性质的一个较为详细的讨论，参考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第 194~200 页。

② 斯科特认为，在殖民地国家，与德、日等国不同，想反对或限制市场经济全面影响的政治势力，除了造反，没有什么力量或完全没有力量让社会承认自己。

③ 这个词是我自己对斯科特观点的概括，因为并不像黄宗智、秦晖等人所说，斯科特只是强调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的意义，“道义经济”涉及一般农民与村内富人、与村外精英、与政府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认为它是多重的网络。

④ 斯科特对农民生存伦理与道德期待的分析，受到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学”研究的影响。

⑤ 反之，波普金则将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比作一个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有关这里所说的农民政治行动的保守性质，可以参考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池子华等译，商务印书馆，2007）中对 20 世纪 20 年代华北红枪会的研究。